

前言



受委为“纳丹访问学者计划——新加坡研究”（SR Nathan Fellowship for the Study of Singapore）的首位学者时，我还懵懂不知所以。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所长贾纳达斯·蒂凡先生在电话上告诉我“你只需要讲讲关于新加坡的事情就可以”。他接着说，纳丹先生希望我能成为这项以他名字命名的访问学者计划的首位候选人。我对纳丹先生敬佩之至，因此欣然接受。

而我那时对于自己要讲些什么却丝毫没有头绪，何况还要听来言之有道，因为这些演讲最终将是九个月里共计十多个小时的五场讲座。学者、公务员、专业人士或外交官都以追求专业知识为业，而我既没有这样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才干。

我那线性进展的事业发展轨迹尚算一帆风顺，但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将我培养成为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上了三所大学，用了九年时间，只拿到了区区一个经济学学士学位。我曾

经是记者，笔下的话题不拘一格、十分广泛，但我并没有成为某个特定题材的权威。除了年轻时是个狂热的背包客之外，我对酒店业知识一窍不通，却创办了一家酒店业集团。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被斯坦福大学开除的本科生，我还被委任来开办一所管理大学。

我最无可救药的特性之一是，我对许多事情都充满了怀疑和好奇，这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和磨难。我曾对许多听众——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说，我精神生活中最主要的动力是最具颠覆性也最具解放性的三个字：“为什么”。

“为什么”这三个字把我抛出了斯坦福，在加利福尼亚州入狱，使我有二十年时间被禁不得进入美国，后来又因《内部安全法令》在新加坡被拘禁。我确实是麻烦缠身，从童年到成人，因为问“为什么”被贴上了叛逆者或麻烦制造者的标签。

但我的初衷从来不是要挑战事情本身。诚然，提出“为什么”，然后循着问题引领你的方向前行，其实往往带你兜了一整圈，最后又回到了起点。尽管如此，你的原信念经过独立的、批判性的探索之后，会变得更加坚定；在自我探寻的过程中会变得更加强大，在“为什么”的引领下，我坚定了自己的许多基本信念，也发现了许多创新领悟。

我秉持着这种态度，来到了公共政策学院的纳丹访问学者系列讲座。我想问问看，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在新加坡发生，又或者为什么没有在新加坡发生，然后循着自己的直觉找到可能的答案。这是段惬意的个人历程。

不像有些著述主题缜密，立论充分，我只能一路随兴发挥。每场讲座之间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间隔，前一场讲座结束一周后，我就开始思考下一场讲座的内容。我只需要提前为每一讲确定大致的主题。在慌乱和些许走投无路中，我所采纳的构想并不十分新颖，干脆照搬了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就这样，我那些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便出炉了，它们是：政策与治理，经济与商业，安全与持续性，人口与家庭，以及社会与身份。

主题确定之后，我沿着50年的时间脉络提出问题，这样就不会被当下的某些课题分散注意力，从而可以提出一些基础性的、原则性的问题。我所找寻的是那些显而易见却又被大家忽略的现象，也就是英国俚语中所说的“房间里的大象”。这些现象静寂无声，大象无形，隐约朦胧，大多数人对它们视而不见。我在这次系列讲座中的任务就是确认和描述这些问题，同时鼓励人们思索这些问题。

第一讲的主题是政策与治理。显然，有个未被言明却大家心里有数的话题，那就是人民行动党是否能长盛不衰。历史并没有宽待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政党，大多数政党都没能维持超过半个世纪，而人民行动党却不然。人民行动党几乎没有依循这样的历史模式，它充满活力，深受欢迎，在新加坡庆祝金禧同时哀悼建国总理去世之际，全面掌控着国家和民心所向。

但在什么情况下，新加坡或许会发生变化？人民行动党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失去民心和权力？人民行动党的标志是能力

和廉洁，却并不是受欢迎程度。第二、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和选民会与建国一代及第二代人完全不同吗？他们能找到共同的愿景、目标和社会契约将新加坡带向下一个五十年吗？如果不可以，那么反对党已经为未来接班做好准备了吗？

第二讲是关于经济和商业，这部分的戏剧性变化较小。对新加坡的基本经济策略进行过本质分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我国和世界经济格局瞬息万变，只要我们一如几十年前一样持续扩大和深化我们在各项产业领域的的能力，我国的经济将持续稳健地发展。我还提议重新思考建屋发展局在未来五十年中的定位和作用，其角色应该更倾向于屋价调控者而不是公共住房的垄断开发者。

第三讲是关于安全与持续性，在这一讲中我建议应该实施女性国民服役。就像有关建屋发展局的课题一样，我无法提出即刻的解决措施。但我确实觉得，相较于以军事准备为目的的国民服役，某些集中于民防和社区服务的国民服役形式对我们的女性同胞和迅速老龄化的社会更加有利，同时也有利于培养起以国家为重的思维和心态，在未来必要时接受女性服兵役。在与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女学生交谈时，我感到她们对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反应积极（前提是只要国民服役不中断她们的学业），这让我深受鼓舞。

我从外部、内部和公民三个层面来讨论安全问题，对此课题我建议《内部安全法令》做出调整，并建议暂停鞭刑。不过媒体关注的焦点却是，作为一名前政治犯，我竟没有提出废除

《内部安全法令》。我将在讲座中深入探讨我们在未来五十年废除鞭刑的可能性。

在进入第四讲时，我开始有点“政策专家”的模样了。“退休金充足度”，即新加坡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安度退休生活，是个热点话题。除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外，这个问题还牵涉到政府出台的多项措施。在回顾过这些措施之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让广大民众能够理解的简单的总体性概念，因为过去五十年里提出的许多措施都很复杂而且有时在某些部分有所重复。所以我提出了“增值公积金”（CPF-Plus）这个设想。此外，为了鼓励生育，我研究了一些北欧国家成功案例，探问我们是否也敢于尝试同样的措施。

最后一讲适逢李光耀先生去世后不久。当时举国哀悼，新加坡人在沉痛中重拾国家统一团结之感，在此背景下，我又回到了曾在第一讲中提到过的课题：我们要寻求的是凝聚式多元（cohesive diversity），而不是单一的或者简单的国家意识。

我兢兢业业地在整个系列讲座中紧扣讨论主题，力求以局外人的视角，保持客观的态度。在系列讲座结束的时候，我分享了自己寻找身份认同的经历。我希望个人故事的分享和彼此间的求同存异能够成为我们迈向凝聚式多元的起点。

新加坡过去五十年的辉煌，归功于务实且适宜的政策，以及参与民主制的畅行无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政治和政策的复杂性将使我们不得不权衡利弊，例如为了民众的高度参与而在公共管理效率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只要有更多的公

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和广大民众能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这个共同的目标而进入思想的集市，让自己和自己的想法都接受公众监督，不畏讥讽，我们的社会定将继续繁荣。

“新加坡未来50年系列讲座”就是我对构建这样一个思想集市所作出的贡献。起初我本打算以此得到学术认可，结果却是一部对新加坡未来繁荣发展的大胆推测和建言。

我热切地希望，我们能迈向更加开明且更具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社会。纳丹访问学者计划及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应该成为每个人标注在日历上的大日子。将来加入纳丹访问学者计划的学者们应该不仅仅是架设起公民社会、学界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也应该将对话甚至是争论提上议程。

一如本书中所言：

未来五十年，在李光耀先生离去后的新加坡，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界线将开始模糊；我们将不再是遵守纪律、从不质疑的盲从者。我们的领袖将和我们并肩同行，而不是走在队伍的前列；领导者将不只是引导一场全国性的对话，而是作为对话的一部分。另有一些人也许会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前进。也许从外面看进来，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整齐划一。但是我确实希望，我们为国家继续繁荣而进发的那份热情，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的那份自豪，以及对造就新加坡人凝聚式多元的那份情怀（也许“新加坡人”这四个字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尽相同），可以世代流传。……

毕竟，公民社会不是纪律严谨的军队；也不是组织严密的乐团在演奏舒缓动听的交响乐。它是震耳发聩的喧嚣，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意见，充满了杂乱无章的志向和抱负，充满了来自令人雀跃的思想集市的人声鼎沸。

当看到我的讲座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时，我备受鼓舞。据贾纳达斯蒂凡在讲座结束后的观察，一般而言，随着系列讲座接近尾声，听众人数通常都会减少，只有时间充裕的退休人士才会坚持听讲。但我的系列讲座，听众数量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而且年轻听众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我家、我女儿家和其他一些休闲场所中，与我儿女的朋友圈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一系列非正式讨论，对我准备讲座帮助极大。我的得力研究助理杨志坚在安排这些讨论和研究方面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他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些边缘青年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只要有坚强的决心和不懈的努力，就能打造属于自己的梦想。

我已经在讲座结束时感谢了那些促成我这次讲座的人们，他们是贾纳达斯蒂凡、遴选委员会、纳丹先生和我的家人。

此书也要献给我的父亲何日华和母亲李廉凤，他们的经历中所饱含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为我发问“为什么”埋下了种子。

当然，我的莽撞行为有时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的后果，那全是我咎由自取，与我的父母无关。只有当我为人父母，现在成

为一位祖父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生活和指导他们处事，是多么困难和痛苦的事。我的父母在我固执己见时依然包容和关爱着我，是他们的明智给了我时间和空间去寻找“为什么”的答案。

衷心感谢我的终生伴侣和一生挚友Claire（张齐娥）38年来的支持和思想与理想的分享，她用一句话总结说我是：“社会主义为心，资本主义为用”。对我的三个孩子和他们的配偶，感谢你们向我介绍了你们这一代人的忧虑，我们数个小时讨论的内容也出现在这本书里。最后，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孙子——我的第一个孙子在几个月前刚刚出世——他才是未来五十年的真正后继者。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我在最后一讲中这样解释：

13世纪波斯诗人鲁米曾写道，“汝非沧海之一珠，汝乃一珠之沧海。”

换言之，你我并不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不是翰漠中的沙砾，也不是汪洋中的水滴。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整个新加坡。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那些形成沧海的集体认同和历史过往，以此为念，我们将继续相伴同行。

我们每一个人，连同新加坡本身，都是一珠中的沧海。

何光平

2015年8月24日，新加坡